

钩沉、辑录、参考大量珍稀文献史料
搜寻、发掘、运用诸多第一手材料
披露鲜为人知足可征信的生活史实

20
世纪
中 国
知识分子
生活状况

马嘶 著

百
年
冷 暖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D668
45

0110260



201102608

马嘶 著

百年冷暖

中華書局影印
新編古今圖書集成

北京圖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年冷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状况/马嘶著.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6

ISBN 7-5013-2127-2

I . 百… II . 马… III . 知识分子－生活－状况－中国－20世纪 IV . D66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7779 号

书名 百年冷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状况

著者 马嘶 著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发行 (010) 66126153 传真 (010) 66174391

E-mail Btsfxb@publicf.nlc.gov.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华正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5

版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386 (千字)

印数 1—5000

书号 ISBN 7-5013-2127-2/K·563

定价 29.00 元



目 录

引 言	(1)
一、从士到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发展概况	(2)
二、自由择业与国家分配：中国知识分子的谋生方式	(6)
三、经济收入与物质、精神生活：中国知识分子生活 状况	(8)

上编 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

第一章 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7）	(13)
一、北南两大知识群体：北京教授群和上海出版家群	(14)
二、一般知识分子的经济收入	(24)
三、金融货币状况对知识分子生活的影响	(27)
四、著名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	(28)
鲁迅：为买房而负债	
胡适：海外学子，归来后跻身上流社会	
王国维：一介寒儒，半生清贫，神秘的死为世人留下难解 之谜	
顾颉刚：债台高筑的历史学者	
哈佛三杰：吴宓、陈寅恪、汤用彤	

白马湖文人群：夏丏尊、丰子恺、朱自清、俞平伯、朱光潜

创造社作家群：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

第二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8～1937） (65)

一、一般知识分子的薪俸和生活标准 (66)

二、大学教师的经济收入 (68)

三、大学师生的衣食住行 (72)

 1. 衣 (72)

 2. 食 (77)

 3. 住 (87)

 4. 行 (104)

四、上层知识分子的生活情趣 (106)

 1. 闲谈 (106)

 2. 逛旧书铺书摊 (111)

 3. 吃馆子 (115)

 4. 听戏 (118)

 5. 对弈、雀戏、打桥牌等等 (121)

五、著名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 (125)

 鲁迅：自由职业者的鲁迅成了文坛旗手，又是有着丰厚经济收入的中产阶级

 胡适在30年代初、中期

 周作人：苦雨斋中自逍遙

 张恨水：畅销书作家的经济收入和日常生活

 金岳麟：玩蛐蛐儿的大学教授

 张大千：千金散尽还复来

六、青年作家的生活状况 (149)

 巴金：从未拿过薪水的文人写作不是为了挣稿费，稿费却源源而来

 胡风：繁重的工作，寒伧的生活

 萧军和萧红：一对流浪夫妻

 金克木：少年漂泊者

第三章 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 (164)



一、中国学人大迁徙	(164)
1. 清华师生的南迁	(168)
2. 北大师生的南迁	(178)
3. 南开师生的南迁	(182)
4. 流浪的大学师生	(184)
5. 文人的逃亡	(193)
二、“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199)
三、抗战时期的物价飞涨与货币贬值	(205)
四、战时知识分子生活状况	(206)
1. 大后方大学师生生活状况	(206)
2. 大后方文人生活状况	(234)
3. 沦陷区知识分子生活状况	(247)
4. 解放区知识分子生活状况	(259)
第四章 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	(264)
一、抗战胜利后内迁大学师生复员情况	(264)
1. 西南联大复员以后	(264)
2. 复员后的北大	(267)
3. 清华园的接收与光复	(271)
4. 南开大学返天津	(274)
5. 其他大学复员简况	(276)
二、内战爆发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	(280)
三、“反饥饿”中的大学师生生活	(285)
1. 北京大学	(285)
2. 清华大学	(296)
3. 南开大学	(301)
4. 浙江大学	(302)

下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年以后）

第五章 建国初期（1949~1966年上半年）	(309)
一、解放初期平津等地高校师生生活状况	(309)
二、解放初期一些著名文人的生活	(316)

三、货币改革、工资制度、稿酬标准和物价状况	(335)
四、知识分子生活状况	(347)
1. 一般知识分子的经济收入	(347)
2. 大学师生生活状况	(348)
3. 知识分子在 1957 年	(356)
4. “三年困难时期”高级知识分子受宠	(366)
5. 五六十年代的高收入者	(371)
第六章 十年浩劫时期 (1966~1976)	(384)
一、知识分子的“牛棚”生活	(384)
二、无罪流放：知识分子在“五七”干校	(392)
三、“死有余辜”的“臭老九”	(400)
1. 老舍之死	(401)
2. 蔡伯赞夫妇之死	(407)
3. 赵树理之死	(410)
第七章 改革开放时期 (1979 年以后)	(413)
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与知识分子政策	(413)
二、知识分子的艳阳天	(415)
三、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好时光	(417)
1. “脑体倒挂”问题浅析：知识分子的经济收入	(418)
2. 知识产权与知识价值	(421)
3. 自由择业与人才市场：知识分子就业中的竞争机制	(427)
4. 文人脱贫：从穷教授到富学者	(432)
5. 圆了书斋梦：新时期学人文士的衣食住行	(439)
6. 大学生生活状况	(443)
余编 从大学教授与政府官员的薪俸对应看知识分子社会经济地位的变迁	(446)
主要参考书目	(452)

引　　言

这是一部研究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书。说是“研究”，也许是过于庄重和自诩了些，其实，目前我所做的只是搜寻、发掘、揭示、陈列之类的工作，搜寻、发掘、揭示、陈列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中曾经存在过的一些生活实景，展现出这一百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的苦乐悲欢，以及他们在这个泱泱大国中的定位，并且以今日的中国社会作为参照系，提出一些无声的诘问，以供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学术史和文学史家，以及那些谋划、制定、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和分配制度的“为人谋”者们进行比较研究之用。同时，也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把它当作一面镜子，时常照照自己，从中得到某些启迪和教益。当然，这个群体之外的一些人也许会感兴趣的。

这些材料都是完全可靠、绝对可信的，因为我所用的全是第一手材料，或者转引自其他书籍、报刊资料中援引的第一手材料以及那些当事人、知情者们的日记、书信、回忆文字等等。因此，书中所写虽有颇似天方夜谭式的神奇诡秘，让今日年轻读者们难以置信，但这些又绝非是子虚乌有的小说家言，而是有事实可证的信史。

我希望能把这些真实的人生故事写得有趣些、轻松些、可读性强些，因为它不是严谨厚重的学术论著，而是写给更多人看的大众读物。我希望读者会从这些描述中，能够更多了解前辈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人们只知其盛名却又并不十分了解他们生活状

况的人的有血有肉的一生。

1845年夏天，24岁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出版了他的处女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意在揭示1844年以前英国工人阶级的悲惨处境和恶劣的生存状态。当时，他还只是从资本家对工人们一些小的欺压现象中去寻找原因。到了1892年，已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恩格斯，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版撰写序言时，他发现英国的社会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而且知道了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去寻找。但是，恩格斯并没有悔其少作，他还是原封不动地把这本书重新献给读者。很显然，恩格斯认为展示那一种曾经存在过的真实是必要的。因此我觉得，虽然在目前，中国知识分子的境遇和精神状态已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但是重新展现一下过去一百年间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实景，仍是必要的。

在具体展现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状况之前，我们应该讨论一下有关知识分子和本书内容的几个问题，然后再以时间为序，去看那些活动着的“西洋景”。

一、从士到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发展概况

通常认为，读书人在古代被称为“士”，在现代社会被称为“知识分子”，因而今天的知识分子就是古代的士。其实，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并不完全等同于古代的士，而且，“士”的含义也是在不断变化着的。

在商周时代，“士”多指武士，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士”又多指有学问的人，即“文士”。先秦诸子皆是文士，即《韩非子·显学》中所说的“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的那些人。秦汉以后，士指的就是读书人了。

在中国历史上，士这个阶层总是与“道”结下不解之缘，《论语·里仁》中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以论



也。”因而，古代的士多有政治抱负，他们把为开明的君主服务作为理想，他们总是为一定的政治服务，这个抱负就是做官。后来，实行了科举制之后，士就迷恋着“受尽十年寒窗苦，一举成名天下知”了。士的出路是做官，一些在科举考场失败了的人，没有机会去做官，便开私塾教学生，另一些失意者便逸隐山林，成了隐士。

在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之后，士也发生了较大变化。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思想文化的侵入，特别是一批年轻的士子出国留学，便造就了一批批有着新的视野、观念和知识的知识人。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意义上的士遂渐渐演变为近代知识分子。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知识分子才壮大、独立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并且在职业结构上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多元局面，出现了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实业、法律、教育、文化、新闻、出版以及边缘学科交叉的多种职业并存的繁华盛景。根据其学历的高低、掌握知识的多寡、社会职业的尊卑、经济收入的高低等等，知识分子又分为高级知识分子和一般知识分子两大类，前者包括大学教授、学者、科学家、工程师、作家、艺术家、律师、主任医师、编辑、记者、高级职员等等，后者包括中小学教师、工程技术员、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员、办事员、医护人员、大学生等。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知识分子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

虽然今天的知识分子同古代的士已是不同的概念，但士的某些精神特征和思想影响至今仍在部分知识分子的灵魂深处或隐或显地存留着，一定程度支配着他的价值观乃至人生观，如：“士为知己者死”、“士可杀而不可辱”、“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等等。这些便是知识分子是由士演化发展出的一些痕迹，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一种恒久的根性。

按照通常的说法，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中国的知识分子约计不到500万人。其中，中等学校毕业和具有中学文化程度者约400万人，高等学校毕业或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

度者有 25 万人左右（其中曾到外国留学者 2~3 万人）。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各类学校迅速发展，知识分子队伍也便大幅度增长起来。

以高等学校为例：

1949 年 9 月 21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据此，政府首先接管了旧学校。当时的学校分为公立、私立和教会所办三种类型，公立学校约占 60%，中国人办的私立学校占 30%，由外国人办的或接受外国津贴的教会学校占 10%。

第一个被解放军接管的是国立清华大学。1948 年 12 月 15 日，当时北平尚未和平解放，解放军第十三兵团进驻海淀，解放了清华园，1949 年 1 月 10 日，北平军管会正式接管了清华大学。从 1952 年 9 月至 1956 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逐步将全国 79 所高等学校改为公立。自 1950 年下半年起到 1951 年底，在华的教会学校全部被政府接收过来。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津沽大学、协和医学院、铭贤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华中大学、金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华西协和大学等改为公立；沪江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齐鲁大学、求精商学院、震旦学院改为中国自己办的私立大学。

从 1952 年开始，进行了大规模地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当时，全国共有高等院校 227 所，其中，大学 65 所，占高校总数的 29%；专门学院 92 所，占 40%；专科学校 76 所，占 31%。院系调整后，全国共有高等学校 184 所，其中，文理科综合大学 14 所，工科院校 38 所，师范院校 33 所，农林院校 29 所，医药院校 29 所，财经院校 6 所，政法院校 4 所，语文院校 8 所，艺术院校 15 所，体育院校 4 所，少数民族院校 3 所，气象专科学校 1 所（以上情况参阅了董孟怀等著《百年教育回眸》，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此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飞速发展，各种专业人才需要量急剧增加，招生人数逐年增加，一些新型的高校纷纷建立，高等学校和在校师生数量同步增长，甚至是成倍、数十倍地增长了。

笔者是 1953 年秋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那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肇始之年，高校招生人数超过了以往历史上任何一年。当年，全国高校计划招生 7 万人，实际招生 8.2 万人，录取新生中，有工农速成中学第一批毕业生 1500 余人。由于当时生源不足，一般高中毕业生基本上都能考上大学，只是学校有所不同，高分者进入名牌大学，低分者进入普通高校。

此后，高校招生基本上是逐年增加，1954 年录取新生 9.2 万人，1955 年录取 9.8 万人，1956 年录取新生 18.5 万人，1957 年录取新生 10.6 万人，比上年减少了近 8 000 人。1958 年招收新生 26.6 万人，1959 年招收新生 27.4 万人，1960 年招收新生 32.3 万人，成为建国以来的高峰。1961 年招收新生 16.9 万人，比 1960 年减少了 15.5 万人。1962 招生 10.7 万人，1963 年招生 13.3 万人，1964 年招生 14.7 万人，1965 年招生 16.4 万人。1966 年“文革”开始，全国高等学校停止按计划招生 6 年之久（1970 年和 1971 年曾在部分高等学校试点招收工农兵学员），全国停止招收研究生达 12 年之久。“文革”结束后，1977 年又恢复了高考，招生工作于第四季度进行，新生于 1978 年 2 月前入学。本年，全国有 570 万青年报考，高校共招的新生 27.3 万人（包括 1978 年第一季度增招的新生 6.2 万多人）。1978 年，恢复了招考研究生的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共有 6.35 万多人报考，经初试、复试，210 所高校、162 个研究机构共录取研究生 1.07 万人。1978 年，全国有 610 万应届高中毕业生和知识青年报考，高校招收新生 40.2 万人（包括扩大招生 107045 人），比 1977 年招生猛增近 13 万人。1979 年，全国高校招生 27 万人，应届考生 468 万人。到了 2002 年，全国高校已达 1263 所，招收新生竟达 275 万了。

现以北京大学为例，说明知识分子的发展概况。

北大在校学生，解放前的 1948 年 10 月是 2 817 人，解放后，

1949年10月是2 402人（农学院已独立），1950年10月2 538人，1951年10月3 569人，1952年6月3 606人。院系调整后，1952—1953学年第二学期，学生注册人数为4 205人，其中本科生3 406人，专科生207人，研究生266人，进修教师41人，外国留学生285人。1953年，招收本科生978人，研究生160人，到年底，在校学生共4 213人。1958年9月31日，学校公布的统计数字是学生8 983人，教授143人，副教授53人，讲师179人，助教、教员1 024人。到了北大百年校庆前的1997年，全校共有8个学院、21个系、87个学士专业、3个第二学士专业、149个硕士专业、101个博士专业、52个研究所、63个研究中心、2个国家高级研究中心、42个国家重点学科。在校学生22 854人，其中本专科学生9 671人，硕士生3 514人，博士生1 240人，另有函授生和夜大学生7 413人，来自72个国家的留学生1 007人。有专任教师2 100多人，其中教授810人，副教授840人，博士生导师536人。现有中国科学院院士29人，中国工程院院士2人。2000年，北京医科大学并入北大，北大的师生人数便更多了。

其他高校的发展情况也大致如此。这便是现今中国知识分子概况之一斑。

二、自由择业与国家分配：知识分子的谋生方式

从古至今，士或知识分子的谋生方式基本上有两种模式，一是自谋职业，一是官家选派。

在科举制度实行之前的社会里，士的谋生手段主要是自行择业。士，作为有知识有本领的人，总是不甘于老死家中或以农耕为业，但在非商品经济社会，可以谋生的职业是极少的，那时候，士的理想和孜孜以求的便是做官。要做官，就要想方设法得到明主的赏识，于是，这便有了游说之士。春秋战国便是士到处



游说、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以期得到有权人的赏识、从而加官进爵的自由发展时期。那些周游列国之士，多是既有一套政治主张和治国平天下的韬略，又巧舌如簧的有本领之人。孔子就是周游列国终不得重用之后，才回到家乡办学育人的，但他和他的学生们总是念念不忘来讲他们的治世之道的。苏秦能佩六国相印，凭的就是他那治国安邦之策和三寸不烂之舌。

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为士的就业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在当时，开科取士不能不说是一种较为合理的人才升迁的机制，在那样的社会里，“学而优则仕”，是士的人生追求。于是，这便产生了诸如“头悬梁”、“锥刺股”之类士子发愤苦读的故事。那时，士的出路几乎只有这样一条，此外，便只好开馆授徒了。

在士变成知识分子的近现代社会，知识分子基本上是自由择业的。那些为人所知的具有高深学问的知识分子是有着较高社会地位的，因而他们就常是被聘任到某个为人艳羡的岗位上。鲁迅在1909年从日本留学归来后，便被聘到杭州两级师范学堂任生理和化学教员，一年后又到绍兴府中学堂任监学，1911年又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即校长）。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他被教育部总长蔡元培聘任为教育部部员。胡适是1917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准备博士论文答辩时，接到了北京大学的聘书，他尚未正式取得博士学位，便来就任北大教授。陈寅恪是1925年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读书之时，受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的。

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崩溃，这三十几年中，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上是自谋职业，因而也便有了“毕业即失业”的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中专毕业生一律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这种分配制度保证了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又失去了人才流动的活力。这种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的人事制度，有点像封建社会的开科取仕，但其根本区别是，开科取仕只限于做官，而国家分配则是照顾了学以致用的多种职业并重的原则。但是，这个制度有时被简单化和官僚主义化，又会出现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才的健康成长。

这种分配制度一直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时，大中专毕业生的分配制度才有了重大改变。

三、经济收入与物质、精神生活：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

士产生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且产生了文字之后，由于士识字而且懂得一般劳动群众所不知道的书本知识，因而自古以来，士的社会地位就高于劳动群众。

每个人都有最起码的生活需求：温饱，而士的生活需求则比一般劳动群众为高。《史记·孟尝君列传》讲，孟尝君养士（食客）三千，有个叫冯谖的士，一见吃得不好，便敲着剑唱道：“长铗归来兮，食无鱼。”孟尝君知道了，就给他做鱼吃。一天，冯谖又唱道：“长铗归来兮，出无车。”孟尝君就让他出门坐车子。这说明孟尝君对待士的优厚，也说明士不只是要求温饱，而且要吃饭时有鱼，出门时有车。

到了近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的生活需求更高于一般体力劳动者。他不仅要吃饱穿暖，还要讲求饮食质量、营养；因为有许多社交活动，他要穿长衫，穿西装；他不满足于有个能遮风避雨的住室，还要有个书房、会客室等等。不是么，那些在社会上很有影响的大知识分子，便常常有十分宽裕的寓所（不管是购置还是租赁）。鲁迅于 1919 年购置的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 11 号住宅，是一所三进院落的大院，二门是外院，有外客房南屋三间；二门内，中间有北屋三大间，前院又有东西厢房各三间，后院有一排九间的北屋。他与周作人失和后，搬出了八道湾，又于 1924 年买了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胡同 21 号住宅。这是一个小四合院，原有陈年老屋六间，经过鲁迅设计改修后，建成了北屋三间，南屋三间，东西厢房各

两间的四合院。胡适任北大教授后，住的房子越来越宽敞。开始住在南池子缎库后身 8 号，这是学校的宿舍，不久，他就搬到钟鼓寺 14 号，这是个普通四合院，有门房、两侧厢房、后面的正房、耳房、厨房等。后又搬到景山大街陟山门 6 号，这是一座公馆，房子多，庭院大，有长廊，厨房里有机井。1930 年 11 月，胡适离开上海回到北京，又租住了米粮库 4 号的房子，这里比陟山门更宽敞了，还有汽车库、锅炉房等。抗战胜利后他再回北京任北大校长时，住的是东厂胡同 1 号，这所房屋，大总统黎元洪曾经住过。张恨水在抗战胜利后回到北京，买了北沟沿甲 23 号的一所宅院，共有四进院落，30 多间房，环境清幽，居住舒适。

当然，这些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居住条件优越的例子，不过，一般知识分子的居住条件也是优于普通工人、市民的。

除了衣食住行这些物质生活，知识分子还要求丰富的精神生活。他要买书，看电影，听戏，逛公园，游名山大川，这些，既同他的职业有着直接间接的关系，又是他的生活情趣和精神享受。此外，他还要交朋友，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这些都同那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穷苦劳动者不同。

